



贾平凹

农民作家张效友

□贾平凹

效友和我几乎是同龄人,是名副其实的农民作家。他出生在毛乌素大沙漠边缘的定边县石洞沟,只上到小学三年级,但对文学的痴迷到了癫狂的状态。他一边忍受着贫穷和身体的多种疾病,一边没黑没白、废寝忘食地爬格子,是文学上真正的苦行僧,正体现了他的“明知文学苦,偏做苦行僧”的文学坚守精神。

效友的《国家誓言》尚未来得及细读,但他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《青天泪》却是知道的。效友虽身处底层,但文学视野却

坚韧与执著的追求

□雷涛

大约是在五六年前,经贺抒玉老人介绍,我认识了张效友。当时,效友说自己虽然已50出头,但钟情于文学,只有文学能救他,能改变他的命运。对于他所立下的誓言,我一则以喜,一则以忧,说喜,是文学战线多了一位执著的追求者;说忧,是以他的未上完小学的文化程度和终生务农的全部阅历,以及本来就很羸弱、病魔缠身的身体现状,能在文学创作这条崎岖的山路上攀爬吗?我当时就想劝他去打工或干个小生意养家糊口,不要为文学徒劳付出生命代价,只是出于私谊,话到了嘴边又收回了。

时隔不久,他又来找我,还带了许多陕北特产,有小米、黑豆、荞面、粉条、沙辣油等等。他背了好多,说除了送我,还要送文学界的许多熟人。看着他消瘦的身子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,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惻隐之心。本来还想劝他不要搞文学,又一次讲不出口了。

后来几年,他不时地通过电话或手机和我联系,讲他的家庭以及个人命运,也讲对社会、时局的看法,并慢慢地讲述他的创作计划。说实话,尽管已成了熟人,可是对他的文学感觉和文字功力仍持怀疑态度。因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,我常常在午休、深夜或黎明时分听到电话或手机响起,打开一看都是张效友的,就有一种既推辞不了又有些烦躁的心理。除了不断打电话、发信息,他还时不时地乘长途汽车把土特产一次又一次地送来。当我多次看见他把这些土特产分了又分、端详了又端详,然后扛起来分头向朋友送去时的身影,我终于打消了对他的所有烦躁,一股理解、同情和赞许的心情占据了上风。

一个强烈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萌生:这个张效友如此坚韧和执著,说不定哪一天真的能写出一部有分量的长篇小说,而且一定是反腐倡廉题材的。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陕北人民身上共有的品格和习性——敢想敢做,认定了事就下功夫去干,咬定青山不放松,不达目的不要休。我还由此想到了曾经贫瘠的老区为何能出李自成、张献忠,又为何能出貂蝉和兰花花。这就是地域文化使然,这种独特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对接之后所

一部反腐倡廉的社会政治小说

□李 星

《国家誓言》是张效友先生继《青天泪》之后又一部长篇小说,对于一般写作者来说,十几年磨出一部小说,可能是一种低效率,但对于熟悉并了解张效友的人生历程和文学道路的人来说,却不仅不会苛责他,反倒会心生敬佩。

张效友因为家境贫寒,小学未毕业就回乡务农,但他却从未放弃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积累。不幸的是,他赶上的正是人妖颠倒、是非混淆的“文革”年代,面对丑恶黑暗的现实,年仅18岁的他由懵懂到觉醒,萌生了以小说形式鞭挞假恶丑、歌颂真善美的想法,并终于付之实践。虽然通过自学他已经具备了一些写作知识,但要从长篇小说创作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从开始写作到《青天泪》的出版,他付出了将近20年的光阴。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梦,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人生苦难:他被人称为不务正业的“疯子”;妻子不理解他,烧掉了他的“生活日记”和《青天泪》初稿,他差点自杀;妻离子散,债台高筑,几近家破人亡……正是依靠对文学的痴迷,他一次又一次挺过来,终于迎来了《青天泪》的出版,并被破格吸收为定边县文化事业局的干部。

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的张效友,本来可以享受稳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生活,但他却继续在文学路上跋涉。他想,当初放弃公社工作,是为了文学梦,为了抒发出对社会现实的理想和爱憎,今天人民给了我条件和机会,更不能安于现状,不思进取。历时十年,他终于完成了表现人民愿望和爱憎的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国家誓言》,攀登上了他文学之路上的又一高峰。

《国家誓言》以对党和人民事业深厚的感情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,从作者自己的现实感受出发,以媒体已经披露的腐败案件为素材,在虚构、想象的基础上,揭露了以盐川市委书记寇昌雄为首的党内腐败分子触目惊心、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。其意义不仅在于直面执政党内部腐败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,以唤起人们的高度警觉,还在于其表现出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、长期性和复杂性。

在小说情节结构和故事设计上,作者不仅在故事情节的展开,矛盾的激化上多用心,而且在力量的对比与矛盾的转化上也颇费心思,显示出作者驾驭大题材、结构大作品的能能力。作品一开头就写了对市长孟浩君的审判,各种力量、各色人物一开始就处于风口浪尖的位置,使矛盾冲突在很高的层次上展开。而属于腐败集团的窦维兴之死,对于案件性质的鉴定,又使两种力量处于你死我活的激化阶段。这次斗争表面上是以反腐败力量转入地下,坏人全面得胜而结束,但是邪恶势力却开始走了下坡路。垣凌霄父子已成功进京,站在了有利位置,被陷害的江海云必将拼死一搏,受害的工厂工人已经觉醒,走上了集体抗争之路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,腐败分子内部已经开始分化,而猖獗疯狂的寇昌雄在被提拔之后,也未享受到更多的喜悦,他

作家需要一种勇气

□李国平

时代与民众索要什么?

恩格斯在写给玛·哈克奈斯的信中说过:“您的小说,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之外,最使我注意的是,它表现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勇气。”张效友距艺术家也许还有距离,但他的创作却有着真正艺术家所具有的勇气。作为一介草民,张效友并不掌握官场资源,他的创作考虑到他写作的具体环境、写作反腐题材所遇到的阻力与压力,他的作品所充盈着的纯粹和正气,恰和今天的许多文学作品形成了对照。当代反腐题材文学作品的热销和引发的热议,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在文学的实践和体现以及市场化的结果。但更深刻的原因,则是这类作品反映了时代情绪与社会诉求。考察反腐小说形成的轨迹,不难发现,它和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进程相平行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,权力和利益、权力和金钱互为寻租,腐败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。

张效友的《国家誓言》是典型的反腐小说,作品触及的是社会热点,是热点主题,同时也是社会主题、时代主题、国家主题。作品通过两组人物矛盾冲突的描写,歌颂指向和批判指向都非常明确,作品的批判多在道德层面,较深刻地揭示了权力和腐败的关系,呼唤着一种更文明的体制和社会公信力。作品的前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一部分的写作,有叙事,有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刻画,对正反派人物的价值观、人生观揭示得较为充分,作品的逻辑链条清晰;但后半部描写案件进程和反派人物的行政过程、行为过程较多,心理冲突、精神纠葛揭示较少,文学性略有减弱之势。

作家的社会忧虑和我们的艺术期望

□何西来

官员腐败是一种政治瘟疫,它的大面积流行、蔓延,严重地侵蚀着党的机体,败坏着党的形象,毁灭着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,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。“庆父不死,鲁难未已”,腐败不除,党将不党,国将不国。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,都把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提高到亡国的层面加以强调,向各级干部敲响自律的警钟,原因即在于此。近年来,在惩治腐败上,党和国家又进一步加大了工作的力度。陕西定边作家张效友的长篇新作《国家誓言》,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孕育的。作者把他的这部小说称作“地地道道的反腐倡廉的政治小说”,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、作为社会的良知,对党政官员中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的忧虑。

在艺术方法和叙事策略上,作家选取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全能叙事角度,展开了盐川市尖锐复杂的反腐倡廉斗争的画卷。作品的故事,始于原市委常委、市委副书记、市长孟浩君,他因贪污、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,被判处极刑。孟浩君是建国以来A省贪污数额最大的厅局级干部,达800万元之巨。按照刑律,他被处以极刑,也是罪有应得。问题是在与案件有关的线索、证据并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,市委书记寇昌雄就干预该案并促使其仓促结案上报,在获省高院批准和最高法院核准下达执行死刑命令后,迫不及待地吧孟浩君送上了西天。他之所以这样做,是为了保护自己,保护一大批甚至比孟浩君还要贪婪的腐败分子。

故事的主要冲突是在盐川市的干部队伍中展开的,时刻围绕着反腐倡廉这条主线。在这场邪与正的对决中,正的一方,是以市委副书记江海云、检察院检察长垣凌霄、垣凌霄的儿子——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垣岩柏等人为代表的。在作品里,正的一方相对处于弱势;垣岩柏虽一直坚持正义,但他先是被调离,后来在赴盐物县上任的路上遭到手借助黑道的暗算,险些丢了性命;江海云,也是先被调离现职去省委党校学习,后又遭到诬陷,受到对手精心设计的“嫖娼”圈套的栽赃,他说不清道不明眼睁睁被冤枉。他们的反腐败斗争,反倒像当年地下工作那样,只能秘密进行,且处于整体的守势,而可能支持他们的省委书记林树略,还远在北京的中央党校学习,过一些时候才能回来;另一位可能支持他们的省纪委书记因病住院手术;省长肖紫龙在省委常委中也是形单势孤。当然,从全国反腐的大局看,上有中央的决心与部署,下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,即使是在如盐川这样的地方,在不久的将来,局势也会转化到对坚持正义、坚持党性的江海云他们有利。

虽然从长远来看,腐败分子肯定会覆亡,会受到应有的法律的惩处,但至少在作品结束的时候,他们还正处于弹冠相庆的巅峰。在盐川市,腐败分子们因为实际存在的利益链,而结成一张严密的、类似于毒蜘蛛网的黑色网络。这个网络是由一些利益相关的官员编织的,它由本应属于人民的各级权力系统、施政系统异化而来,蜕变而成。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本应有的共产党人、人民公仆的身份,一个个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、吸血鬼。

寇昌雄,他的公开身份是盐川市委书记,有着全国人大代表、劳模等许多耀眼的光环或头衔。在市长孟浩君犯事被捕、被审、被判处伏法的过程中,寇昌雄利用手中的权力、狡诈圆熟的权术,成功地灭了口,完成了与这个本是他们同伙之人的切割,不仅保全了自己,而且保全、强化了他的权力和他的团伙。他成了这里党政最高权力的掌控者,而他的这个团伙则是骑在600万盐川人民头上作威作福、横征暴敛、敲骨吸髓的特殊利益集团,是盐川人民的死敌。常务副市长曹志瑞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欧阳云瑞,还有中院院长廖承熙、财政局长窦维兴等,都是寇昌雄培植的死党,同时他们各自又都操控着某一重要方面的大权,可以利用这些权力为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团伙寻租。

在省里,寇昌雄又与有权在握的副书记彭延举结成死党,在盐川为彭本人和他的儿子彭飞虎谋取开采油井等的巨大利益。在省纪委,副书记窦维山也早被他收买,窦宝林跑到这位族叔那里告状,也还是没有跳出寇昌雄的手掌心。寇昌雄的厉害之处在于,他和彭延举利用盐川市领导班子大调整之机,表面上是通过正规干部考核程序,实际上却是少数人暗箱操作,不仅把自己安排到省里做了副书记,官升省部级,而且把他的狐朋狗党都安排到了各级领导岗位。盐川权力的大树,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蛀虫,几乎被蛀空了。腐败分子们在未被揭露、未成阶下囚之前,都有着公开的和私下的两重身份、两副面孔、两种语言,公开的是官员的身份,讲着官话,满口的马列主义,满口的社会名词,满口的仁义礼智信;在私下,在他们团伙亲信之间,则男盗女娼,灯红酒绿,吃喝嫖赌抽,什么缺德事都敢干。

居安思危。张效友作为作家,正是从对寇昌雄腐败团伙的揭露和批判中,表达了他深沉的社会忧虑与危机意识。他的这部作品的价值就在于,向我们的民众,向我们的官员,展示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、紧迫性。“载舟覆舟,所宜深慎”。

作者在后记中说,《国家誓言》是他的政治反腐小说三部曲的第二部,第三部《国家尊严》已有了初步的计划与构思,在第二部中也为后续故事情节的展开,预设了伏笔和线索,预留了空间。为了使第三部写得更好,从第二部看,艺术上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还是很大的,如叙事的过程还可精炼;人物性格个性化还可以加强,以摆脱类型化的倾向;与人物性格紧密联系在一起,让人过目不忘的细节与对话,包括心理分析,都还可以加强。正如恩格斯一再强调的,要让倾向自然而然地从描写中流露出来,要“莎士比亚化”,而不是作家自己跳出来做鉴定、贴标签。

本版责编:武翩翩 王兕 孙燕峰